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先生刊

1

北 京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姬德顺

30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七九年 第一辑

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北京出版社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20,000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书号：10071·250 定价：0.73元

目 录

致读者 (1)

鲁 迅 研 究

《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	唐弢	(3)
鲁迅论左翼文艺运动	马良春	(13)
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若干问题	西羽	(41)
鲁迅和增田涉	戈宝权	(61)
鲁迅小说风格初探	田本相	(92)

回 忆 录

老虎尾巴	钦文	(122)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的早晨	阿英遗作	(132)

作家作品研究

茅盾早期思想研究	乐黛云	(134)
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耿云志	(159)
柔石论	王保生	(187)
在中国“今天和明天之交”的无产阶级 作家——洪灵菲	鲍昌	(213)

作家自述

- 许钦文 (226)
吴伯箫 (228)
碧野 (233)
菡子 (236)

札记

- 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四) 林非 (240)
中国新文学史漫笔 吴泰昌 (268)

年谱

- 叶紫年谱 胡从经 (282)

动态

- 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 (12)

致 读 者

在当前文化学术界逐步活跃，正为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而努力的新局面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与读者见 面了！

本丛刊创办的目的，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阵地，以利交流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促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以五四为发端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的新文学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彻底反帝反封建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这是它不同于我国过去一切时代文学的崭新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许多著名作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也是这个时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研究我国现代文学，不仅可以弄清这个时期文学的历史面貌，总结发展规律，而且可以得出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经验，作为文学为实现“四化”作出贡献的借鉴。

本丛刊以发表有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文章为主，内容包括文学运动和斗争、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等几个方面。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

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此外，本丛刊还刊登一些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以及有关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专题资料。

本丛刊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欢迎同一研究题目但见解不同的论文，以利于展开学术讨论。

本丛刊以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为对象。

本丛刊由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聘请人员组成编委会，和北京出版社合编。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

我们的刊物在创办过程中，得到许多大专院校和文学研究机关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希望，这个刊物能在大家的帮助下，对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

唐 疊

五四运动到今年六十周年了。在中国，六十年一个甲子。回顾六十年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当时白话文与文言文、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垒中，以其出色的现实主义的小说，第一个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也是新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在中国的诞生。

鲁迅后来追述他的创作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①改革社会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他说的想要利用的“力量”，则是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力量，现实主义小说反映出来的生活真实的力量，这个前提决定了鲁迅所要采用的创作方法。他写了将近三十个短篇，集成《呐喊》、《彷徨》两书，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晦明交织，新旧起伏。完全和旧民主主义时期所谓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不同，鲁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白话应当是我们民族的新语言，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真实地表现了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鲁迅善

①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于从形象创造中揭示社会问题，为文学创作通向现实主义开辟了新的艺术途径。

在鲁迅的作品里，无论是鞭挞还是鼓励，是唾弃还是赞扬，他的笔墨始终没有离开社会现实。他宣判了封建主义的死刑，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无力，要求知识分子摆脱“空虚”和“动摇”，同时对广大农民的革命觉悟寄予殷切的期望。鲁迅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的现实主义植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且自觉地与革命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以发展的观点观察生活，思索生活，描写生活，因而使许多作品在严峻的现实解剖中时时闪烁着明天的亮光。和世界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比，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具有更高、更新、更深刻、更富于战斗力的特色。因此，从“五四”起，鲁迅的创作即以其特有的时代和个人的色彩——一种时时向前看的色彩，和过去的任何现实主义作品区分开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在鲁迅的创作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鲁迅创作的这一特色，在他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鲜明。作者的创作方法在这里已经十分完整和自成一格，并且熟练地驾驭了各个故事，由此而回顾早期作品中时隐时显的这样的特色，可以肯定地说，鲁迅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开创者，经过不断发展，他又是一个杰出的典范。

《故事新编》共收故事八则，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①，从开手写作（一九二二年）到结集成书（一九三五年），先后经历了十三年。鲁迅于一九三二年自述他的创作方法的艺术概括手段是：“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①《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恰如他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所说：“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从这点上说，除了现实生活和历史材料有所区别外，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鲁迅运用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概括手段，基本上是一致的，持续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由于写作时间的不同，作家世界观的变化，在《故事新编》里，不仅消弭了类似《彷徨》那样不断求索的痕迹，同时，曾经闪烁于《呐喊》各篇中的明天的亮光，却有了更大的发扬，形成一种信念，稳定地烛照着一切。这就使鲁迅的现实主义增进了革命的因素，出现了新的理想的光芒。不仅和《彷徨》、《呐喊》比起来是这样，就以同书里后写的五篇和先写的三篇相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先说写得较早的三篇。

最早写的是《补天》。《补天》写于一九二二年，曾以《不周山》为题收入《呐喊》第一版。作品根据女娲“搏黄土作人”^②和“炼五色石补天”^③的神话，描写了这位人类的母亲淳朴浑厚的形象。鲁迅自述其最初的意图是：根据佛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④。佛洛伊特学说对资产阶级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用“性的发动”^⑤解释人类和文学的起源是错误的，但《补天》的主旨却不限于此。全篇写原始宇宙气象雄伟，景物瑰丽，仿佛一幅色调浓烈的油彩画。女娲搏土作人时充满着创造的

①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② 参见《太平御览》引《风俗通》。

③ 参见《淮南子·天文训》。

④ 《故事新编·序言》。

⑤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喜悦，补天的辛勤展示了劳动的壮美。作品的具体描写实际上已经冲破了佛洛伊特的理论，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表达了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类社会所怀有的热烈的希望。至于因赶不上鳌背逃难、伏在海边自打嘴巴的小老头，头上顶着长方板、穿着古衣冠的小丈夫的出现，证明作家的笔触由神话转到现实，而在艺术描写上，基本上遵守着现实主义的要求和法则。

四年以后，鲁迅从北京来到厦门，一个人住在石屋里，面对大海，又从古书里掇拾材料，完成了《奔月》和《铸剑》。《奔月》写神话里夷羿和嫦娥^①的传说。善射的羿射下过九个太阳，射下过封豕长蛇，还有许多大动物和小动物，最后，“射得遍地精光”，只好天天和嫦娥一起吃乌鸦炸酱面。嫦娥熬不过这样的生活，终于吞下金丹，独自向天上飞升。鲁迅安排下一个典型的环境，勾画出羿的正直的性格，写出了一个勇士的孤独的心境。《铸剑》发表时原名《眉间尺》，取干将铸剑，其子复仇^②的故事。黑色人是作家着力描写的对象。他仿佛生来就是为人复仇似的，具有一种热到发冷的性格，一言一动，都象眉间尺背上的宝剑一样寒光逼人。眉间尺把复仇的事业，连同自己的头和宝剑托付他，黑色人最后也割下自己的头，以回答眉间尺的信任，完成了复仇的重任。从《奔月》里的逢蒙到《铸剑》里嗜杀的国王和颟顸的大臣，人们仍然可以在作家的鞭挞中看到现实生活的投影。正如《补天》歌颂了女娲的劳动和创造一样，《奔月》和《铸剑》也歌颂了羿和黑色人的战斗的性格。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里说过，托尔斯泰作品里每一个叫做聂赫留多夫的人物，都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化身，是从托尔斯泰身上分裂出去的某一性格的发展，表现了各种各样的托

① 参见《淮南子·览冥训》。

② 参见《列异传》与《搜神记》。

尔斯泰。我们从女娲、羿、黑色人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到鲁迅的影子，鲁迅的某一性格特征的发展。当时鲁迅还没有从现实中充分地看到推翻旧秩序的积极力量，他选择历史人物，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通过他们正面地表达对生活的愿望与意志。由于这些原因，小说在字里行间，又不免时时流露出寂寞和孤独的情绪。

写于后期的五篇就不同了。

如果说前述三篇还带有作家写作当时思想上的某些弱点，因而使创作方法也受到一定的约束，那么，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在后写的五篇里有着深刻的反映，作品概括的内容更为开广，因而也更保持了时代的历史具体性。中国人民历经军阀战祸与自然灾害，农村经济破产，城市生产萎缩，到三十年代初，又发生东北事变，黄河决堤，蒋介石大举进攻革命根据地。一切新的和旧的社会渣滓乘机泛了起来，有用爱国口号募捐敛财的军阀，有借赈灾名义营私舞弊的政客，有的人空谈“民气”，有的人高诵佛号，大学教授和名流学者也纷纷出动，各树旗帜。文艺领域的思想更为混乱，逃避现实的作品不断出现，其中有歌颂田园情调的诗歌；有描写三角恋爱的小说；有人提倡小品文，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有人劝青年读《庄子》与《文选》，宣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鲁迅对这些现象表示极度的愤慨。当时攻击时弊的杂文经常遭到禁止，他于是想起八年前曾经采用过的艺术形式，重新回到历史题材上来。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致肖军、肖红信里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① 这段话生动地证明，《故事

①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七一七页。

新编》的出现，是受了现实生活的刺激，采用的是历史材料，针砭的却是当前社会。鲁迅抱着坚定乐观的信念，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他所接触的素材进行概括，既有充分的生活根据，又有大胆的艺术想象，这样，后写的几篇不仅具有更为尖锐更为泼刺的批判力量，而且塑造了在他本人作品里从未出现过的、平凡而又高大的正面人物的形象。

《理水》和《非攻》在这方面是应当特别提到的。夏禹治水和墨子《非攻》在中国古史上都有记载。相传夏禹婚后第四天就出去治水，在外八年（一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在人民理想中是一个公而忘私、出身下层平民的领袖。鲁迅笔下的禹既具有劳动农民的外貌：“黑脸黄须，腿弯微曲”，一个粗手粗脚的莽汉；又概括了中国农民优秀的品质：勤劳、刻苦、朴素，从沉默中显出坚韧和力量。作品通过各种场面——文化山上学者烦琐无聊的议论，水利局里大员声势煊赫的考察，以卑微的灵魂和庸俗的言行，反衬出禹的高大，从而塑造了这个来自人民的英雄。墨子是一个躬自操劳的古代知识分子。和儒家相反，他是庶民阶层利益的代表，主张身体力行，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的学说以非攻、兼爱、尚侠、好义为主。作品写他衣衫褴褛，胼手胝足，却又勇敢，机智，充满着忘我的精神。当楚国筹划进攻宋国，他一面昼夜兼程去劝阻楚王，一面又吩咐学生管黔敖作好战斗准备：“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整个故事环绕着墨子的行动直接展开：一路上过宋入楚，以正义折服楚王，凭实学战胜公输般。鲁迅在《理水》和《非攻》里歌颂了两个正面形象，正如他一九三四年在一篇杂感里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①禹和墨子正是被当作“中国的脊梁”来描写的两个代表。

评论一个作家的时候，在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系上一条红线，机械地将两者连结起来，这是极大的错误；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一点影响，具体的问题需要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②鲁迅在塑造禹和墨子的同时，又以饱含感情的笔墨，描写了墨子的学生禽滑厘、管黔敖，禹的一群面目黧黑，衣服破旧，不动、不言、不笑，象“铁铸一样”的不知名的同事，还有敢于和鸟头先生争辩的乡下人。这些人物以其具体的行动，共同表现出一种正面的道德观念，在对比中压倒了公输般、曹公子、文化山上的学者、水利局里的大员，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鲁迅否定后者，这是对现实生活中牛鬼蛇神的挞伐；而肯定前者，则又说明和“五四”时期不同，群众在他的思想里已经成为积极的力量，禹已不感觉寂寞，墨子也无须象黑色人那样孤身奋战了。一九三四年，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里说：“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但他并不自囿于这一点，于是另辟蹊径，新编故事，在历史人物身上熔入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热情地表达了对人民群众及其代表者的赞美与歌颂。这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升华。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都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再创造，对当时社会思想消极一面的形象的批判。《采薇》写的是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因“义不食周粟”^③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中国的儒

①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 《史记·伯夷列传》。

家历来都把伯夷叔齐看作是“肥遯养高”的标率，唐朝的韩愈还写过《伯夷颂》。鲁迅写《采薇》时，外患频仍，国势日蹙，一些遗老遗少正在传播所谓“王道”，想以“不合作”代替积极的反抗。鲁迅选择这段历史，着重地描写伯夷叔齐从“养老堂”到首阳山——全部窘迫的遭遇和仓惶的心境，同时鞭打了社会上那些趁火打劫、卖身投靠、散布流言等等的行为。小说从伯夷和叔齐的“通体都是矛盾”的性格发展中，说明这种消极抵制的软弱无力，展示了他们毫无出路的悲剧的命运。《出关》写老子西出函谷的故事。老子的哲学尚柔，孔子的哲学也尚柔，不过孔子以柔进取，老子则以柔退却；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行家，老子却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要想无所不为，结果只好一无所为，他其实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空谈家。《出关》写老子和孔子的对话、西行途中的遭遇，通过生活细节的渲染，批判了老子处处退却的落寞心情。《起死》以《庄子》《至乐》篇中一个寓言为主，用独幕剧似的形式加以演化。庄子在《齐物论》里宣扬虚无思想，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出发，主张物我等观，泯灭一切生死、古今、大小、贵贱的区别。作品写他到了是非关头：当那个死了五百年的髑髅复了形，生了肉，活了转来，缠住他讨衣服讨包裹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一反原来的主张，唠唠不休地别生死，辨古今，分大小，明贵贱，一心想要划清物我，力争是非了。鲁迅以生动有趣的对话，彻底地宣告了“齐物论”的破产，证实虚无思想本身只落得一个虚无的下场。民族失败主义思想在三十年代相当泛滥，知识分子中消极反抗、逃避斗争和虚无厌世等等应运而生。鲁迅应用艺术形象进行扫荡，和杂文呼应作战，从远处着眼，为“现在”抗争。这些作品的形式在他只是一种尝试。把握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让理想融注到历史材料里，现实生活里，使文学作

品发挥艺术特征，更好地为政治服务，在这方面，鲁迅是“五四”以来现代作家中一个杰出的典范。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故事新编》还是“速写居多”^①，后写五篇在这点上尤为显著。例如写老子，反复地用一句同样的话：“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象一段呆木头。”写伯夷叔齐因“扣马而谏”被逐，四个甲士两次向他们“恭敬的”立正，举手，然后将他们挟走，推开。其它如墨子和公输般的对话，巡士抓住庄子衣领的场面——无论是人物塑造或是情节铺叙，都和《呐喊》、《彷徨》不同，基本上采取勾勒的方法，并且时时加以漫画化。作品里有许多现代生活的穿插，这种穿插被当做细节运用是和漫画化的要求相适应的。鲁迅没有涂饰和隐讳这些细节的现代色彩，而是将它们作为夸张的一种手段，使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通过渲染鲜明地突现出来。一些现代概念在这里愈是明显，愈不至于和历史事实混淆起来，读者也就有可能从内在意义上理解它们，将它们看做是作为形象运用的某种物质或者精神的代名词，从而获得更加难忘的深刻的印象。鲁迅对果戈理的《鼻子》作过这样的评价：“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的手法。”^②运用了现代生活细节的《故事新编》，“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③，而是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出了他们的形象，既不违背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又从中照见了“五四”以后特别是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的灵魂。从这些特点分析起来，《故事新编》，正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部非凡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1979年4月28日写于北京

①③ 《故事新编·序言》。

② 《鼻子》译文后附记，见《鲁迅译文集》第十卷，第六六〇页。

• 动 态 •

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教育部于北京召开的一次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组织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参加筹备会议的，有全国部分高等院校的代表二十余人。代表们畅谈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术界出现的大好形势。为了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共同探讨高等院校现代文学科研和教学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经常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和经验，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能够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服务，筹备会议决定：在高等院校范围内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会议选举王瑶同志任会长，田仲济、任舫秋同志任副会长。

经这次北京筹备会以及随后在西安举行的现代文学教材会议代表们酝酿协商，推选出学会理事有（依姓氏笔划为序）：丁尔纲、公兰谷、支克坚、叶子铭、华忱之、孙中田、邵伯周、吴奔星、严家炎、陆耀东、林志浩、单演义、黄曼君。并指定其中部分同志组成秘书处。会议为部分大区保留了若干理事名额，俟适当机会增选、补选。

筹备会议决定：创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研理会会刊；由秘书处草拟《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章程草案》，准备印发征求意见。

鲁迅论左翼文艺运动*

马 良 春

揭开了江青、张春桥等叛徒特务的历史，使人们知道，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是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对立面，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的走卒。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鲁迅逝世不久，江青、张春桥等却“谬托知己”，把自己装扮成鲁迅的战士和学生，而到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当他们全盘否定与鲁迅不可分割的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也还唱着肯定鲁迅的调子？对于这一类似乎反常的现象，革命导师们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列宁说：“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象，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①长期以来，“四人帮”“颂扬”鲁迅的种种作法，正是把鲁迅“偶像化”“庸俗化”，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愚弄广大革命群众，掩盖他们三十年代反革命历史，另一方面，他们通过

* 此文前三部分曾以《给历史以科学地位》为正题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五、六期合刊。纳入本文时经作者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并增写了第四部分。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74页。